

# 三十年来四川鸦片问题研究述论\*

## ——兼论《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分布及价值

李庆宏, 刘 婷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清季民国四川鸦片泛滥,对四川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三十年来,学界对四川鸦片问题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从时间来看,偏重民国时期;从地域来看,偏重考察四川全省;从内容来看,偏重研究民国四川烟祸与禁烟问题。要之,缺乏清代四川区域鸦片问题个案研究。幸《南部档案》保存鸦片史料卷宗较多,为研究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提供可能。

**【关键词】**清季民国;四川;鸦片;《南部档案》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3-0091-05

鸦片有洋药与土药之别,四川土产鸦片也称川土。研究表明,四川种植鸦片罂粟制作烟土的历史约从清道光年间开始,从滇西引种而来<sup>[1]</sup>。在近代中国的鸦片生产中,四川占有重要的地位,烟土产量一度占全国总产量40%<sup>[2]</sup>。显然,四川鸦片问题极具代表性。

笔者检之文献,目力所及,唯有一部专著即秦和平的《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sup>[3]</sup>对四川鸦片问题进行了全景式专门研究。此书共十六章,分别考察四川清代鸦片罂粟传入与种植、鸦片税厘征收、鸦片贩卖与秘密会党关系、清末至民国初年禁烟运动、“防区制”时期鸦片泛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禁烟等问题。

### 一、四川鸦片贸易及其产业链研究

清季民国,四川鸦片产量约占全国同类数的1/3以上,其收益也占全川农业产值的1/3以上<sup>[4]</sup>。四川形成栽植、贩运、消费为一体的鸦片贸易产业链,对四川社会产生重要影响。鲁健《近代四川的土药经营》<sup>[5]</sup>以重庆开埠(1891年)为分界点,首先考察重庆开埠前四川土药栽植、土药厘金征收、土药商品率低下原因;其次论述重庆开埠后四川土税局成立对经营四川土药的影响;最后分析经营土药对四川社会影响。秦和平《川江航运与咽喉消长关系之研究》<sup>[6]</sup>考察川江航运与咽喉团体消长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乾隆年间西南地区铜、铅业的开采与贩运,导致滞留纤夫逐渐形成咽喉团体;光绪年间因鸦片外销与走私等消化了部分外来移民,咽喉团体逐渐消亡。黎虹《鸦片与清末西南社会》<sup>[7]</sup>阐述清末四川鸦片泛滥原因、影响,并分析清末四川禁烟得失。刘君《近代四川藏区鸦片贸易及其社会危害》<sup>[8]</sup>以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为史料,首次系统论述近代四

川藏区鸦片种植、运输路线、价格、贸易市场以及对四川藏区基层社会造成影响等问题。秦和平《鸦片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其种植面积考订》<sup>[9]</sup>对四川鸦片传入、分布、种植面积有系统考察。周邦君《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sup>[10]</sup>着重考察晚清四川区域罂粟种植、面积、产量等问题,并从自然与交通条件、技术因素、经济刺激、政治环境分析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动因。周邦君《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sup>[11]</sup>主要考察晚清四川鸦片贸易、消费、禁烟等问题。黄坤《清末四川鸦片种植的赋税因素》<sup>[12]</sup>认为清末四川鸦片广泛种植的经济动因是清末四川各种赋税的征收。向春风《重庆开埠前后的四川鸦片贸易》<sup>[13]</sup>对重庆开埠前后四川鸦片贸易出口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并论述鸦片贸易对四川社会的影响。张鹏《清末川土税厘的征权与遗存新探》<sup>[14]</sup>以五个川土税厘遗存为例,具体论述川土在生产、运输、征权等过程的详细情况。秦熠《鸦片种植与凉山彝区社会变迁(1908—1949)》<sup>[15]</sup>分析凉山彝区(1908—1949年)鸦片种植原因,论述鸦片种植与贸易在凉山彝区引起的三个社会变迁;接着以晚清民国时期凉山彝区面对“纳入民族国家统一进程”与“随同整个国家社会近代化”两个问题为切入点阐述凉山彝区社会变迁途径;最后得出结论:加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是外部性力量的介入。

郑小晶《四川的烟馆行业及其在“六年禁烟计划”中的生存状况初探》<sup>[16]</sup>共分三章,分别论述四川烟馆行业兴起、繁荣及其成为四川军阀重要财政来源;四川烟馆行业经营状况和社会作用;四川烟馆行业对“六年禁烟计划”的回应。作者认为四川烟馆行业在“六年禁烟计划”中虽遭到沉重打击,但并

收稿日期:2015-06-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1&ZD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庆宏(1989-),男,江西新建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区域社会史。

未彻底取缔,为后来烟祸埋下祸根。卢志顺《民国四川鸦片产业探析》<sup>[14]</sup>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民国时期四川鸦片产业,共分四章。分别论述民国四川鸦片产业历史渊源、主要产区、种植面积、鸦片年产量;民国四川鸦片从罂粟种植、生产加工、贩运销售、消费市场等整个鸦片产业链形成;四川鸦片产业与农业、工商业以及财政税收关系等问题;四川鸦片产业发展变化原因。

综之,学界主要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对清代四川鸦片栽植、贩运、消费等方面论述鸦片贸易产业链对四川社会的影响。

## 二、四川鸦片烟祸与禁烟研究

清季民国四川鸦片泛滥形成烟祸,四川在1906年严厉禁烟与南京国民政府“两年禁毒六年禁烟”(也即1935—1940年)时期从禁种、禁吸、禁运等方面禁烟,总体效果明显。林寿荣、龙岱《四川军阀与鸦片烟》<sup>[15]</sup>论证鸦片是四川军阀财政最主要来源和最大支柱。李隆昌《“防区制”时期四川的鸦片烟祸》<sup>[16]</sup>考察“防区制”时期四川鸦片泛滥、鸦片税捐征收对四川农村的影响。龙岱《四川军阀时期的烟祸》<sup>[17]</sup>认为军阀时期四川烟祸产生主要原因是军阀割据与混战,军阀通过预征田赋、苛杂重税、烟土走私和包揽商运等手段攫取鸦片利益。粟时勇《民国时期四川省禁烟概述》<sup>[18]</sup>概述四川军阀混战时期(1917—1933年)鸦片泛滥三点原因及“两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1935—1940年)四川禁烟机构的设置及职能。莫子刚《近代四川颁行的第一个禁烟法规》<sup>[19]</sup>论述近代四川第一个禁烟法规《四川省禁烟施行细则》颁行原因、主要内容及其特点。秦和平《关于1937年利济财团及统运处统制烟土失败的思考》<sup>[20]</sup>以1937年四川省禁烟局与重庆金融界携手组建的利济财团及统运处统制烟土为个案,全面考察利济财团及统运处出台背景、组建和主要条款;分析利济财团及统运处统制烟土失败原因;最后从利济财团及统运处统制烟土失败提出三点思考。证实了“官商分离是现代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法则。”秦和平《二三十年代鸦片与四川城镇税捐关系之认识》<sup>[21]</sup>考察二三十年代四川城镇鸦片税捐征收缘由、种类、征收等实态;主要以重庆、涪陵与成都三地为重点区域,论述川东与川西两地区鸦片税捐与市镇建设、经济增长间互动关系。王克强《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四川禁烟》<sup>[22]</sup>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赵尔巽全宗案卷》为史料,对赵尔巽1907年就任四川总督后,从禁种、禁吸、禁贩展开四川禁烟运动进行

梳理。莫子刚《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sup>[23]</sup>对清末四川鸦片泛滥情况、原因、影响都有论述。屈杨杨《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sup>[24]</sup>以川东鸦片重灾区涪陵为例,论述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四个原因及对涪陵地区造成的四点影响。胡伟、刘萍《民国四川鸦片泛滥的成因及影响》<sup>[25]</sup>考察民国时期四川鸦片泛滥原因、危害。

许焕芳《清末西南四省禁烟运动研究(1906—1911)》<sup>[26]</sup>以清朝第二次大规模禁烟(1906—1911年)为时间,以西南四省(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为空间。其中对清末四川禁烟过程与四川总督、巡抚对禁烟回应对措施有考察。曾娟《1935—1940年间四川大竹县禁烟的历史考察》<sup>[27]</sup>以南京国民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1935—1940年)为时间,以1935年后即为四川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署治所在地大竹为空间,考察1920年代末至1935年前南京国民政府在大竹禁烟背景及其成效;重点论述1935—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大竹禁烟法规、机构、人员与经费等问题;最后归纳1935—1940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大竹禁烟得失。黄芳芳《晚清民国时期西南鸦片流毒研究》<sup>[28]</sup>从历史地理学角度,选取西南大区域,以晚清民国为时间,重点论述晚清民国时期云南鸦片问题形成缘由;考察晚清民国时期四川鸦片流毒时空特征。侯萍《四川松潘县禁烟问题研究(1935—1945年)》<sup>[29]</sup>选取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禁烟运动(1935—1945年)为时间,以四川松潘县为空间。共分五章,论述四川松潘县禁烟背景、措施、禁烟过程中各方利益博弈、禁烟特点与禁烟得失、特殊的历史意义。

要之,学界主要是从民国时期四川烟祸形成原因、烟祸社会影响、典型区域(如大竹、松潘二县)禁烟三方面展开研究。

## 三、《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分布及价值

《南部档案》是目前国内时间跨度较长、较为系统完整的清代州县地方档案。时间跨度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保存档案18186卷,84010件。《南部档案》分吏、户、礼、兵、刑、工、盐七房规档,已成功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 (一)《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分布

《南部档案》保存鸦片史料丰富,为研究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提供可能。检索《南部档案》各房目录,可大致了解《南部档案》鸦片史料卷宗分布情况。



1.以关键词“烟”检索档案目录,《南部档案》保存有2899件档案,各房分布情况见下表。

表一 《南部档案》各房所见“烟”史料分布情况一览表

单位(件)								
房别	吏房	户房	礼房	兵房	刑房	工房	盐房	总计
件数	7	48	44	15	116	2660	9	2899

资料来源:鹿开成、蔡东洲等编.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以关键词“烟土”检索档案目录,《南部档案》保存有508件档案,各房分布情况见下表。

表二 《南部档案》各房所见“烟土”史料分布情况一览表

单位(件)					
房别	户房	兵房	刑房	工房	总计
件数	17	1	10	480	508

资料来源:鹿开成、蔡东洲等编.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以关键词“洋烟”检索档案目录,《南部档案》保存有260件档案,各房分布情况见下表。

表三 《南部档案》各房所见“洋烟”史料分布情况一览表

单位(件)						
房别	吏房	户房	兵房	刑房	工房	总计
件数	3	6	3	13	235	260

资料来源:鹿开成、蔡东洲等编.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我们认为,表一反映清代南部县关于烟(包括烟土、烟草等)所有档案卷宗保存情况,提供研究南部县鸦片问题翔实史料;表二反映清代南部县烟土档案卷宗保存情况,是研究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重点史料;表三反映清代南部县外来鸦片档案卷宗保存情况,籍表二与表三可知清代南部县洋烟与土烟并存;籍表三可知吏房保存有有3件“洋烟”档案,可补表二之缺;表三中260件“洋烟”档案占表二中508件“烟土”档案近52%,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洋烟在清代南部县的强势。表一、表二、表三都显示鸦片史料主要保存在工房,与清代南部县工房执掌有关。据研究,清代南部县衙工房分管“工关”、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禁烟、硝务等<sup>[30]</sup>。

## (二)《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价值

籍前文三表可知,《南部档案》保存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数量较多的南部县县域鸦片卷宗,对晚清南部县鸦片个案研究大有裨益。笔者愚见,《南部档案》鸦片史料价值至少可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1.区域交流。众所周知,鸦片产业链集栽植、贩运、消费等环节为一体,促进了社会分工与资源分配。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时期)区域交流、互动频

繁,区域经济与市场得到长足进步,部分原因与区域间人口自由流动、长途贩运等相关。我们通过爬梳《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周边县域民众(商人)将鸦片贩卖至南部县的比比皆是,笔者列举工房几则例子予以说明:“有垫江民邓合兴来民(梁长春)店内站宿,发卖洋烟。”<sup>[31]</sup>“民(彭鼎丰)隣水县民承领刘大顺资本贩卖烟土生理。”<sup>[32]</sup>“民(李春林)合川民籍领乾镒森资本贩土来治。”<sup>[33]</sup>“小的(王金林)资州民贩卖烟土生理。”<sup>[34]</sup>当然,南部县本地乡镇民众贩卖鸦片的也层出不穷,且举工房如下事例:“民(谢锡顺)在城买叶子药水烟一二斤回场零卖”<sup>[35]</sup>“民(贾葆贞)在镇江庙场出卖熟烟土生理”<sup>[36]</sup>“今四月二十七日小的(向福元)赶河坝场发卖烟土”<sup>[37]</sup>由上所举几例可知,南部县从事鸦片贸易者既有非南部县籍的异民,也有南部县本地民众;贩卖鸦片者既有在南部县城发卖,也有回南部县乡场发卖的。如此,南部县与周边县、南部县下辖乡场反倒因鸦片贸易区域交流增强。

2.消费市场。有研究表明,清末南部县商人在四民社会中的所占比重为8.9%,仅次于务农者比重,位居第二位;同时,在清末南部县实业中,罌粟、于靛、花生在本境销售,每年银约300余两<sup>[38]</sup>。这说明,南部县不但有洋烟的侵入、且也自产土烟,土产鸦片为自销,如此也部分解释了南部县鸦片泛滥原因。我们知道清代南部县共有十乡,即积上、积下、临江、崇教、金兴、宣化、政教、富义、永丰、安仁乡<sup>[39]</sup>。同时,南部县十乡下辖若干个场,这些场根据县城所处方位,按东西南北分为四路,其中东路19场、南路20场、西路16场、北路25场,共计80场,而且每场都有特定的场期<sup>[39]</sup>。鸦片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强烈的成瘾性,一旦上瘾,则难以戒除;加之南部县完善的市场体系,因此,晚清南部县形成可观的鸦片消费市场,我们认为可以理解的。笔者感兴趣的是吸食鸦片者具体实态,诸如吸食鸦片者家住哪?吸食鸦片者性别比率如何?吸食鸦片者年龄结构怎样?吸食鸦片者职业是什么?熟悉州县地方档案者就会知道,完整的状词前面一般都会有告状者(原告)、被告者(被告)诸如姓名、年龄、住地等记载,而阅读状词内容,我们还可知诸如两告身份特征、生计职业、告状事由等有效信息,《南部档案》状词也如是之。因此,通过整理《南部档案》各房鸦片史料卷宗,可深描出鸦片吸食者群体乡镇分布、身份特征、性别比率、生计职业等实态,在此就不再举例。

3.社会实态。作为州县地方档案,《南部档案》

保存有鲜明案件卷宗信息。据统计,《南部档案》保存的18186卷档案中,司法诉讼档案有11000卷,诉讼档案占整个档案数量的60%强。数量浩繁的诉讼档案为研究清代南部县县域民事、刑事、商事纠纷提供了可能。籍前揭三表及笔者不完全统计,将《南部档案》各房鸦片史料保存卷宗数量列表如下。

表四 《南部档案》各房所见鸦片史料分布情况一览表

	单位(卷)							
房别	吏房	户房	礼房	兵房	刑房	工房	盐房	总计
卷数	5	20	25	9	55	384	5	468

前文业已说明,诉讼档案占整个档案数量的60%强,迁移到《南部档案》中鸦片史料卷宗,我们有理由相信因鸦片事宜而引起的纠纷所占比重应该是不少的。同时,笔者在阅读档案中也发现,即使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鸦片,但话语表达中仍然会出现鸦片的因素,兹列举《南部档案》户房所见鸦片史料几例卷宗说明。“同班总役姚顺、姚喜狼狽为奸,弊端百出,卖案压税、指官撞骗,吸烟嫖赌,贪懒旷公。”<sup>[40]</sup>“今因刘朝忠素不安分,开设烟馆窝留有案惯贼张星庆等纵窃为非。”<sup>[41]</sup>“今八月内,黄洪志籍以盐局公款为名,串同杨兴福等来至新镇坝春和店押逼氏(龚王氏)子(龚文郁)讨要,滥食口岸洋烟钱四十一串各归无给。十月十八日复率徐安之同滚刀皮多人仍将氏子私押,滥食等洋烟钱四十三,估逼氏子另借程庆丰等银二十五两作支口岸。”<sup>[42]</sup>笔者感兴趣的是,鸦片不是作为主要因素的纠纷中,

诸如“吸烟嫖赌”“滥食口岸洋烟”“烟痞”等话语表达,其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形态?笔者同样感兴趣的是,即使是在鸦片作为主要因素的纠纷中,县衙、乡里、宗族、地邻等组织或人员对纠纷中两造的处理措施或态度背后蕴含着怎样的历史结构?

#### 四、余论

综上所述,三十年来学界对四川鸦片问题研究取得一定成果,共计28篇文章。从研究时间来看,有18篇文章以民国为时间段,64%强;从研究空间来看,有6篇文章选取四川典型区域(如大竹、松潘二县),22%弱;从研究内容来看,有13篇文章为禁烟研究,近50%。囿于史料的可遇不可求,简言之学界对清代四川区域鸦片问题个案研究还较少。

《南部档案》保存较丰富的鸦片史料卷宗,为学界对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进行微观论证与实证研究提供方便。诚如纳日碧力戈在《格尔茨文化解释的解释(代译序)》中所说:“人文科学要从个案出发,观察和研究具体的个人和群体,捕捉临场的思维活动变化,立足本土社会探寻现象背后的‘活态’逻辑,弄明白当地人如何理解、如何想象、如何解释。”<sup>[43]</sup>因此,我们对清代南部县鸦片问题个案分析,既可丰富学界清代四川区域鸦片问题的个案研究;也可通过考察因涉及鸦片而引起的民事、刑事、商事纠纷,加深对清代南部县县域地方性知识的认知。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2-3;有学者认为四川鸦片罂粟的栽种始于嘉庆初年,参见鲁健.近代四川土药的经营[J].社会科学研究,1987(2):58.
- ②现今,一般认为《南部档案》保存档案总卷数是18186卷,84010件。可参见吴佩林.清代地方民事纠纷何以闹上衙门——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J].史林,2010(4);吴佩林.《南部档案》所见清代民间社会的“嫁卖生妻”[J].清史研究,2010(3);苟德仪.在“耳目”与“蠹贼”之间——从《南部档案》看清季南部县乡约的废除[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吴佩林.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清代地方档案的整理与研究为中心[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
- ③参见吴佩林.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J].法学研究,2008(2);吴佩林.近三十年来国内对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的整理与研究[J].北大法律评论,2011(1);吴佩林.清代地方社会的诉讼生态[J].清史研究,2013(4).
- [1]秦和平.四川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
- [2]鲁健.近代四川的土药经营[J].社会科学研究,1987(2):58-63.
- [3]秦和平.川江航运与咽喉消长关系之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00(1):127-131.
- [4]黎虹.鸦片与清末西南社会[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27(5):106-112.
- [5]刘君.近代四川藏区鸦片贸易及其社会危害[J].中国藏学,2002(3):50-58.
- [6]秦和平.鸦片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及其种植面积考订[J].中国历史,2003(2):13-20.
- [7]周邦君.晚清四川鸦片生产及其动因探析[J].西华大学学报,2006,6(3):39-43.
- [8]周邦君.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7(1):21-25.
- [9]黄坤.清末四川鸦片种植的赋税因素[J].乐山师范学院,2011(2):90-93.
- [10]向春风.重庆开埠前后的四川鸦片贸易[J].宜宾学院学报,2011(2):62-64.

- [11]张鹏.清末川土税厘的征权与遗存新探[J].中国钱币,2011(2):30-36.
- [12]秦熠.鸦片种植与凉山彝区社会变迁(1908—1949)[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31-35.
- [13]郑小晶.四川的烟馆行业及其在“六年禁烟计划”中的生存状况初探[D].成都:四川大学,2007.
- [14]卢志顺.民国四川鸦片产业探析[D].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08.
- [15]林寿荣,龙岱.四川军阀与鸦片烟[J].四川大学学报,1984(3):101-106.
- [16]李隆昌.“防区制”时期四川的鸦片烟祸[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4):118-123.
- [17]龙岱.四川军阀时期的烟祸[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31):98-105.
- [18]粟时勇.民国时期四川省禁烟概述[J].文史杂志,1999(4):68-69.
- [19]莫子刚.近代四川颁布的第一个禁烟法规[J].文史杂志,1999(4):64-66.
- [20]秦和平.关于1937年利济财团及统运处统制烟土失败的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1999(1):76-82.
- [21]秦和平.二三十年代鸦片与四川城镇税捐关系之认识[J].城市史研究,2000(Z2):76-96.
- [22]王克强.从赵尔巽档案看清末四川禁烟[J].清史研究,2003(2):98-100.
- [23]莫子刚.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7(1):162-165.
- [24]屈杨杨.民国时期涪陵鸦片泛滥的成因与影响[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5):77-80.
- [25]胡伟,刘萍.民国四川鸦片泛滥的成因及影响[J].内江师范学院,2013(9):77-80.
- [26]许焕芳.清末西南四省禁烟运动研究(1906—1911)[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7.
- [27]曾娟.1935—1940年间四川大竹县禁烟的历史考察[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0.
- [28]黄芳芳.晚清民国时期西南鸦片流毒研究[D].昆明:云南大学,2011.
- [29]侯萍.四川松潘县禁烟问题研究(1935—1945年)[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3.
- [30]左平.清代州县书吏探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1(6):17-22.
- [31]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6-65-5(依次表示目录号-卷号-件号,下同),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 [32]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7-559-1,光绪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 [33]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8-103-2,光绪六年十月十五日.
- [34]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8-333-13,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
- [35]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6-57-1,同治二年九月二十日.
- [36]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7-363-1,光绪三年八月初三日.
- [37]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9-378-6,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 [38]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39][清]袁用宾修纂.南部县輿图考[M].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 [40]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10-364-7,光绪十六年七月初七日.
- [41]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13-716-3,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 [42]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馆藏.南部档案[A].16-246-1,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43][美]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Sichuan Opium Problem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Discus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Value of Nanbu Archival Documents Concerning Opium

LI Qing-hong, LIU T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Arts,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2)

**Abstract:** The opium was overflowed during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in Sichuan, which had much influence on the Sichuan society.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academic circles acquire certain achievements about researching on the Sichuan opium problem. Seen from the time, which was inclined to Republic of China; Seen from the area, which was inclined to researching on the all Sichuan; Seen from the content, which was inclined to researching on the Sichuan opium-banning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In a word, lacking of case studies in Sichuan during Qing Dynasty. Luckily *Nanbu Archives* preserved abundant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opium, which provided possibility for researching on opium problem about Nanbu county during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and Republic of China; Sichuan; opium; *Nanbu Archives*

(责任编辑:董应龙)